

澳大利亚经典文学名著

我的光辉生涯

[澳] 迈尔斯·弗兰克林 著

黄源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澳大利亚经典文学名著

我的光辉生涯

〔澳〕迈尔斯·弗兰克林 著

黄源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光辉生涯/[澳]弗兰克林(Franklin, M.)著;黄源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4

书名原文: My Brilliant Career

ISBN 978-7-5327-4213-4

I. 我... II. ①弗...②黄...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近代 IV. I61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112 号

Miles Franklin

My Brilliant Career

我的光辉生涯
My Brilliant Career

Miles Franklin
(澳) 迈尔斯·弗兰克林 著
黄源深 译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213-4/I·2329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出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727956

译者序

澳大利亚早期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发表于一九〇一年。它一经问世,便轰动了整个澳洲文坛。当时执文苑牛耳、并被誉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亨利·劳森,赞扬它最真实地反映了澳大利亚世态。影响巨大的《公报》杂志主编 A·G·斯蒂芬斯则声称“这是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大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作品经历了岁月的考验,被文学史家列入“澳大利亚经典文学著作”之林,并被改编后搬上银幕,从而不仅在澳洲,而且在全世界为人所瞩目。

《我的光辉生涯》的作者为迈尔斯·弗兰克林。使人惊奇的是她在撰写这部传世之作的时候,不过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小说是她“兴之所至,在几个星期之内”一挥而就的。这位在少女时代就如此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却并非出生于文学世家,也没有受到过强烈的文学氛围的感染。相反,她诞生在一个忙于养家活口而与文学无缘的牧场主家庭,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群山环抱的丛林地区,度过了童年时代。她的处女作《我的光辉生涯》发表后,由于书中形肖毕现的刻画和描绘使得人们误将这部著作当作自传而招来

诸多麻烦，她愤然离家去悉尼定居，以“自由新闻记者”为职业，接触了一些女权主义者，受到了她们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她移居美国，参加了当地的“妇女工会团”，并任该组织杂志《生活与劳动》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奔赴英国，在苏格兰妇女医院和军队内任职。一九三三年，在离开故土近三十年后，她返回澳大利亚定居，从事专业写作，直至一九五四年去世。

弗兰克林一生共写过十二部小说，大都反映澳大利亚的牧场生活，书中流露出作者本人的女权主义倾向，其女主人公多半机俏聪慧，伶牙俐齿，男人们受到她们无情的嘲弄而显得难以应对。在她众多的小说中，尽管她于五十七岁时出版的《自鸣得意》也颇有影响，但文学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的，却还是她十六岁时的杰作《我的光辉生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

《我的光辉生涯》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贯穿小说始终的女主人公西比拉·梅尔文的形象。小说描绘了她在单调乏味的丛林环境中所经历的苦恼和抗争，刻画了她追求独立人格、富有反抗精神的个性，并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真切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十九世纪末期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的西比拉是一个澳洲丛林少女。她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由于澳大利亚开发较晚的特定历史条件，却并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她在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沟里苦度着光阴。她幼时爬树掏鸟窝，下到深不见底的矿井里嬉戏，稍大就要喂牲口，挤羊奶，擦地板，把喝醉的父亲在众目睽睽之

下从小镇上领回家来。原始的丛林环境和艰难的物质生活锻造出了她粗犷、泼辣、近乎男子汉的性格，培育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奉行“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对一切不合自己意愿的事，会不顾一切地去进行抗争。

但是，西比拉尽管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无缘，却由于她对文学艺术的酷爱而深得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滋养。她与普通农村少女不同。除了“两种状态的生活：工作和睡眠”外，她还有“第三种状态：渴望从事艺术活动”。她大量涉猎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从欧洲文化中吸取精神能量，并且还迷恋上了澳洲本地方兴未艾的民族诗歌，沉醉在澳洲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之中。她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新的生活，因此常常在夜阑人静之时，悄悄地握笔学写小说，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显示自己的才华。尽管她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与严峻的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她从不愿向命运低头，时时在与现实作不懈的抗争。

她在家庭中抗争。由于家境困难，母亲要她分挑养家活口的重担，或做家庭教师，或当厨娘。可是西比拉认为母亲的安排只是让她继续在生活的泥淖中作徒劳的挣扎，根本不可能改变生活的窘境，而且会使她当作家的愿望化为泡影，所以她要奋力抗争。她把家道中落归罪于父亲的酗酒和无能，并且责怪母亲颐指气使，逼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情。她一方面寸步不让地与母亲争吵，另一方面又频频发信给外婆和姨妈，试图借用“外援”来改变母亲的决定。西比拉与家庭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的实质，是她努力冲出旧有的生活轨道，摆脱家庭的羁绊，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要同环境抗争。她厌恶她所生活的波索姆谷，认为它“单调乏

味”、“阴郁沉闷”，没有机会接触她希望厕身其中的文化界人士，是一个“埋没人才的地方”。经过一番苦斗，她终于得到了暂时的解脱，来到了能充分提供她书籍、音乐、娱乐的卡特加。可是由于家庭的变故，她又被迫到了一个比波索姆谷更糟糕、更“死气沉沉”的地方。肮脏沉闷的生活场所、顽劣蠢笨的孩子、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藐视她甚至轻侮她的雇主，形成了一个令她窒息的环境。可是她并不屈服。她当着溺爱娇宠孩子的东家太太面，用体罚惩治了淘气的小东家，显示了自己小小身躯内所蕴蓄的巨大反抗力，终于站住了脚跟。而一旦站住了脚，她又深感这恶劣的环境只能扼杀自己的才华，断送自己的前程，因此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里。小说中的西比拉几乎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满意过。她与社会环境的坚韧抗争，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的求索精神。

她的抗争，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待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在十九世纪的澳洲，金钱始终是传统婚姻观的支柱，这根金制的链条束缚住了女人，使她们成为男子的附庸。但西比拉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独立人格，是真正的爱情。在这一点上，她的态度是从来不含糊的。她拒绝了潇洒大度的格雷先生的求婚，因为他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她感到讨厌。她的外祖母劝她接受将要去英国继承一笔财产的霍登先生的求爱，她却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她的信条是：“要是不爱一个人，即使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要是我爱他，即使他是跛子，我也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她的婚姻观在她的心上人比彻姆家境的变迁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与比彻姆的接近乃至相爱，并不是因为后者的万贯家财，而是他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性格的豪爽。在比彻姆突然破产时，她并没有因为他身陷困境而抛弃他，却

竭力给予安慰,让对方过几年去娶她。而嗣后,当比彻姆的财产失而复得,其本人重又成为遐迩闻名的豪富时,她却悄然离去,认为他“不再需要她了”。西比拉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对男女平等、独立人格的期求,反映了活跃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比拉这个形象就是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女权主义者的化身。

西比拉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本地特色而又内涵丰富的女性形象。她迥异于英国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笔下生活于市井之中或富有牺牲精神、或工于心计的妇女形象,也不同于奥斯丁、勃朗特小说中那些感情细腻、忠于爱情的女性,她是诞生在荒凉贫瘠的澳洲土地上的丛林女子,一方面处于原始落后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却接受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她是身上散发着丛林气息、胸怀远大抱负的澳洲丛林知识女性,她与阻碍自己个性发展的环境与社会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同强烈渴望改变社会现实、树立澳大利亚民族生气勃勃的形象的时代呼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样号召人民:“我们把过去留在身后,连同它分崩离析的王朝、摇摇欲坠的宝座和昏庸无能的种族,我们面前所展示的是未来的澳大利亚——浑身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我们的澳大利亚。”西比拉追求独立人格、不断抗争的精神既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折光,而又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西比拉的呼喊和反抗是微弱的。她就像巨石下的一棵倔强的小草,愈是奋力向上,

其自身就愈是畸形扭曲。作者迈尔斯·弗兰克林不但细腻地叙写了西比拉在环境逼迫下奋力抗争的过程,同时还真实地描绘了这个知识女性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她那扭曲变态的性格。

正如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创造了一大批性格畸零的“多余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封建沙俄帝国没落及资本主义勃起的现实一样。迈尔斯·弗兰克林以她犀利的笔触解剖了一颗扭曲的心,真实地反映了澳洲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重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性畸变。从而使西比拉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以及穿透生活的艺术张力。

小说的书名为《我的光辉生涯》,但西比拉的经历不但说不上“光辉”,而且是再平淡不过的(内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她所生活的丛林环境也是既平庸又乏味。在西比拉看来,身处这种环境,“愈是少对世道刨根究底就愈是快乐,对女人来说更是双倍、三倍地快乐”。可惜她并不是那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她“拥有思考能力”,“为一种狂热的雄心所苦,向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于是主观的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使她产生了一种压抑感。当环境一时有好转(如躲入卡特加这个避风港)时,她心灵所受的压抑,得到了暂时缓解,她于是感到“世界像一个橘子——只要挤它一下,它就会涌出大量的甜水”。但当生活又一仍旧章,甚至比原来更糟时,这种压抑感便剧增,使她觉得那种日子是“一种慢性恐怖”,“生活扭曲着我的灵魂”,甚至“想逃到什么地方,尖叫几声,以排遣过分紧张的歇斯底里的感觉”,这种无法驱除的压抑感使她的性格变形,甚至反常。因此她忽而十分体谅母亲的辛苦,忽而又极度憎恨她,恶狠狠地把她的来信付之一炬,她对待姨妈的态度也是骤然由崇

敬转向怨恨；在姆斯瓦特家做家庭女教师期间，她更是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喜怒无常。这种心灵的扭曲后来终于发展到了近乎“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因为适时地离开那个威压着她的环境，她完全可能像她自己所担心的那样，“准会发病”。

如果说，社会的挤压是造成心理变态的外在原因，那么，比较早地觉醒过来因而对这种巨石般的重压特别敏感，虽然在奋力抗争却又信心不足的思想局限，则是形成西比拉心理变态的内在原因。她自恃志大才高，傲气十足，但又因为自己相貌平平而怨天尤人，深感自己“在婚姻市场上不是一件有价值的商品”，自哀自怜；她一方面鄙视那些浑浑噩噩打发日子的庸人，孤芳自赏地为自己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自鸣得意；另一方面却又总觉得前途渺茫难以摆脱厄运。她既高傲、又自卑。她的高傲使她在与别人接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摆架子，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她的自卑又使她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甚至把他人出自内心的赞扬也曲解成为恶意的揶揄和对自我的藐视，从而用加倍的高傲和刻薄来回击。在西比拉身上，外在的社会挤压与她自身的内心矛盾形成了正负两极，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火花，展现出了她那扭曲了的性格。

西比拉的变态心理集中地反映在她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她虽然正值豆蔻年华、春心萌动的年纪，但对爱情和婚姻却异常冷淡，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恶感。她“讥笑爱情，决定永远、永远、永远不再结婚”；她故意贬低爱情和婚姻，憎恨男人，用刻毒的言词去攻击他们。她公开宣称：“依我看，嫁人，即使嫁给世上最好的人，也是降格的事情。”“爱情是最低级的激情”，“男人是世上最无用、最笨拙的动物。他们只会抽烟、骂人”。然而，她这种排斥异性的心理，并不

是因为她天生厌恶爱情，恰恰是她渴望爱情而终不可得后所走的一个极端(她自叹“爱是属于容貌美丽、富有魅力的人的，而并不属于我”)。她越是渴望爱情，就越是对自己得不到真正的爱失望、愤懑，并以排斥异性作为反抗，而她越是排斥异性，内心便越是感到孤独(她说，“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儿，从爱的世界一头漂落到另一头”。)，因而反过来，也就越是需要爱，她的内心世界就是那么复杂，因而她心灵的折光——她的言谈举止(尤其表现在爱情问题上)也是矛盾和复杂的。她一方面强烈地希望有人赏识她的才情，能同她在文学艺术方面作心灵的交流，但是当多才多艺、风度翩翩而又高度欣赏她才能的格雷先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内心虽不无爱慕之情，表面上却故意显得冷淡，从而使对方极为失望；她多次嘲弄向她诚恳求婚的霍登先生，无疑是出自一种孤僻心理对男人施行的报复；她虽然一直忠实于她的恋人哈罗德·比彻姆，却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他，纯粹为了得到一种变态的心理满足，如她自己所剖析的那样，“是由于自己缺乏爱而感到苦涩，由于自己内心充满了痛苦，所以看到别人脸上也闪过痛苦表情时，我因得到了报复而十分高兴。”虽然比彻姆深深地爱着她，她也喜爱比彻姆坦诚、朴实的个性；虽然比彻姆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她充分发挥创作的才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她的变态、扭曲的性格，最后使她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比彻姆的爱情。这种悲剧性的结尾是西比拉变态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合乎她的性格发展逻辑的。

在西比拉的身上，心理变态者的某些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即一方面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力图改变现状，离经叛道，寻求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严酷和自身的回天无术，

不断地滋生出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从而形成只能靠愤世嫉俗、偏激怪僻的言行来获得暂时的解脱的独特个性。变态心理是一种心理现象,变态心理的产生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尽管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却似乎是相同的,即强烈的自我意识无法得到满足,自我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久久得不到解决,内心的烦躁和焦虑长期郁积,又找不到一个宣泄口,旷日持久的超负荷心理压力,便导致了心理上的变异。正因为如此,动荡变革的时代容易诱发心理变异,而敏感的比较清醒的知识青年又尤其会发生心理变态,形成扭曲的性格。文学家们选取了那些被环境压抑了的人性,由于抗争乏力而滋生变态心理的人物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往往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动态和历史风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郁达夫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乃至澳大利亚当代作家怀特小说中描写的那个认为“只有椅子和桌子没有发疯”的西奥多拉、愿意同蛇“取得充分了解”的黑尔小姐等,都是性格扭曲、心理变态的人物。西比拉·梅尔文为这一列琳琅满目的世界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形象。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末期澳大利亚丛林知识女性的形象,她那在努力挣脱家庭羁绊、婚姻桎梏中所表现出来的扭曲性格和变态心理,正是反映出了当时的澳洲人在摆脱旧自我,寻找新自我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不足乃至心灵的畸变,因此是有着坚实而丰厚的时代基础及地域特色的。

三

西比拉这一艺术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从一七八八年第一批英国移民踏上澳洲土地起,到弗兰克林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它已不再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已占了人口中的大多数,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个性特色的民族,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越来越强烈,要求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作家们,希冀冲破因袭的框框,摆脱对英国传统文学的模仿,确立具有澳大利亚本地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文学的奠基人劳森以澳大利亚丛林为背景,塑造了各类独具个性的丛林人,表现了早期创业者谋生的艰辛、与天奋斗的顽强性格以及偏僻的环境所造成的人性的变异,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澳洲历史上的那个重要的时代。与劳森同时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有弗菲、佩特森等人,他们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但劳森等人所刻画的,基本上都是早期定居者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匮乏求得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也即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很少触及精神世界的活动。而弗兰克林则通过西比拉·梅尔文这一形象,不但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其扭曲的心灵,反映了其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以及在求索过程中所经历痛苦,这不能不说是显示了澳大利亚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光辉生涯》一经出版,便在当时的澳洲文坛上就似乎是“爆炸了一颗小小的炸弹”(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 H·M·格林语),西比拉作为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如果我们按英国文学评论家 E·M·福斯特在他颇有影响的评论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所指出的那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形人

物(flat character)和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两类的话,那么弗兰克林之前的澳大利亚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扁形的,作者只是反复强调人物性格的某一个侧面,而不及其余。如劳森笔下的斯派塞太太对严酷的环境似乎已麻木得失去了作出反应的能力,成天把“毫不在乎”这句话挂在嘴上,她的全部性格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这种单一性格的人物虽然由于作者反复渲染其性格的某一方面而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恰如福斯特所批评的那样,这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显得太露、太浅、太简单,未能具备足够丰富的性格内涵,缺乏再思考、再创造的空间,因而从审美价值来看比圆形人物要逊色。弗兰克林所塑造的西比拉·梅尔文却是一个圆形人物。作者以满含激情的笔触,写出了她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倔强任性、清高孤傲、热情奔放而又自哀自怜的复杂性格。西比拉同情终年操劳的母亲,却又痛恨她不通情理;她向往友情(包括与异性的友情),却又将爱情和婚嫁视为畏途;她讨厌姆斯瓦特的愚昧庸俗,却又对他的诚实忠厚肃然起敬;她深深地爱着比彻姆,却又始终同他若即若离,并最后拒绝了他求婚。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词来概括西比拉多方面的性格。这一人物比劳森等人笔下在某一方面被强调到了漫画化程度的人物,更接近现实、更真实、更富有生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可以说,在《我的光辉生涯》问世之前,还不曾有过如此真实、具有如此丰富性格内涵又有澳洲特色的人物。

西比拉这一形象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小说刻画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自认为才华横溢却没有施展的机会;胸怀大志却感到无力使之变为现实;感到家庭、环境、社会像一根根绳索,捆缚住了自己,终于动弹不得;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虽有

过短暂的欢愉,最后酿成的却是苦酒。总之,人生并不是一朵玫瑰色的浮云,却像一条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道路,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西比拉的这些感觉无疑是同她年龄相仿的男男女女所共有的,小说通过她的曲折历程写出了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苦恼,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企图干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宏图大志与平淡无奇、没有诗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比拉又是属于一切年轻人的。

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它为后人留下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幅散发着浓郁澳洲气息的画卷上,活动着一个生动、丰满、追求独立人格的澳大利亚青年女性,人们可以从她奋斗的曲折历程中,听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足音。

序

我离开澳大利亚前几个月，接到一封来自丛林地区、署名“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信，信上说，写信人已撰写了一部小说，却不认识编辑和出版商，希望我能看看这部稿子，并提出意见。这封信的笔迹具有鲜明的个性，信中的某种东西吸引了我，所以我让作者把原稿寄来。一个沉闷的下午，我开始阅读稿子。还没看上三页，我就知道了你们无疑会立即明白的事情——这个故事出于一个姑娘之手。读着读着我发现这部作品具有澳大利亚特色——植根于丛林。书中有关姑娘家的情绪部分，我不太了解，因而把它留给女读者们自己去判断。可是我觉得，描写丛林生活和景色的部分，不但真实得令人吃惊而且令人痛苦。我知道，就这些描写来说，这本书忠实于澳大利亚——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最真实的一本。

我写信给迈尔斯·弗兰克林，她承认是个姑娘。我离开悉尼之前同她见了面。她不过是个小个子丛林姑娘，年仅二十一岁，几乎没有离开过丛林。她经历了书中所描绘的情况，我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本书而感到自豪，在这里人们劳苦工作，被烈日烤灼，受的苦很多，但

又很善良；在这里有一半皮肤黝黑的丛林人都是富有同情心和幽默感的乐天派，眼睛里镌刻着丛林的悲哀，在最艰难的时刻，嘴角也浮着勇敢的笑容；在这里三分之一的丛林人是诗人，囊中空空，但心胸开阔。

亨利·劳森

1901年4月 英格兰